基于中美贸易博弈视角的全球贸易理论的创新和治理体系的重构

王上铭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DOI:10.32629/ej.v2i4.202

[摘要] 近一年多以来,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起了针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尤其是针对欧盟、日本和中国。从美国发起此次贸易战到世界各国在这个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斡旋、博弈、对策乃至最终的结果来看,以“国家”为对象来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好处的现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存在很大的盲区,无法解释目前许多国家所出现的“逆全球化”运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国家乃至全球福利的好处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利益的影响等问题;不仅仅从“生产”的角度,而是要从“生产”和“分配”两个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以解决部分国家贸易保护加强和“逆全球化”等问题。同时,尽管二战后形成的美苏“双寡头”全球治理体系过渡到了“一超多强”的美式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但显然,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欧盟的一致行动以及俄罗斯的崛起等,美式霸权主义在面对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束手无策,“一超多强”格局在大踏步地向“多强并举”迈进。以单一议题为主的WTO等全球治理平台在面临多议题并举、多目标需要决策、多层次关系需要协调的国际局势也越来越解决乏力,因此,我们需要基于共同的理念,构建共同的国际规则和治理机制;不仅仅以国家而是将国家、私人部门、不同利益群体等均作为治理主体,以联合国为基础,构建一个民主、公平、公正、权威、包容的类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

[关键词] 中美贸易博弈; 国际贸易理论; 全球治理体系; 创新; 重构

近一年多以来,由美国发起针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更是深刻地影响了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各国企业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正如芝加哥的一只蝴蝶轻轻振动一下翅膀也许会导致珠三角发生海啸,此轮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引起的后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从美国发起贸易保护到世界各国政府围绕这一冲突所进行的斡旋、博弈、对策和结果来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解决不了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以“国家”为对象来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好处的现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存在很大的盲区,无法解释目前许多国家所出现的“逆全球化”运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国家乃至全球福利的好处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利益的影响等问题,以解决部分国家贸易保护加强和“逆全球化”等问题。同时,尽管二战后形成的美苏“双寡头”全球治理体系过渡到了“一超多强”的美式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但显然,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欧盟的一致行动以及俄罗斯的崛起等,美式霸权主义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束手无策,“一超多强”格局在大踏步地向“多强并举”迈进。以单一议题为主的WTO等全球治理平台在面临多议题并举、多目标需要决策、多层次关系需要协调的国际形势也越来越解决乏力,因此,我们需要融合并创新现有

的全球治理模式,重新构建一个多边的、民主的、公平公正的、权威和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

1.美国发起此次贸易保护及各国博弈的过程

(1)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USTR发布了《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下称《301报告》),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美方301报告对中国提出了五项指控,包括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政府指使企业境外投资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及其他可能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内容,为发起贸易战提供依据。

(2)3月1日,特朗普宣布向钢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对铝进口征收10%的关税。

(3)3月23日,特朗普正式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同时限制中国投资,中国也采取相关措施应对。

(4)4月4日,中国宣布对包括汽车和大豆等部分美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

(5)美国从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6)6月11日起,美国主要针对STEM专业中国留学生(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签证)重新收紧签证发放时长,部分专业留学生签证重新由5年缩短至1年。此外,中国赴美交流学者限制趋严,

当前限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在美国的中国千人计划学者,而领域也不再局限于高科技行业领域,甚至蔓延并影响到了其他学科学者正常的交流。

(7)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拟对1102种产品合计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白宫的声明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第一组中国关税涵盖340亿美元进口,于7月6日12时正式开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进行进一步评估。

(8)6月15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9)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外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宣称将进一步升级至5000亿美元,这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全覆盖。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505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3752亿美元。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

(10)美国于当地时间7月6日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7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11)7月17日,欧盟、日本在东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欧盟将取消99%从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将取消94%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包括82%的农产品和水产品;今后数年内,将逐步取消99%欧盟进口商品关税。

(12)7月25日,美欧就贸易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目标是开启美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新阶段——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以更好地为全球安全与繁荣而共同努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密切关系。

(13)7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声称:必须同日本协商贸易协定。全球贸易战如果转向美日欧结盟,WTO将名存实亡,世界将形成两大平行市场,国际经贸新秩序面临重建。但是,美欧联盟最大的问题在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欧洲的农业、汽车短期内难以实现与美零关税(尤其法国农业将受到较大冲击)。随后美欧联合声明遭到了法国等的强烈反对。

(14)美国于8月8日宣布,对华进口500亿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亿美元加征关税于8月23日实施。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将对美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8月23日实施。

(15)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于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还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

业采取报复措施,将对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当日回应,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16)10月1日,美加墨协定谈判成功,设置毒丸条款,规定美加墨三国都不得“擅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如某一缔约方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则必须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发出通知6个月终止本协定,并代之以新协定。在没有美国许可的情况下,中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分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将变得极为渺茫;更为严峻的是,美国若将该条款纳入同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协定,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也将受到重大影响。

(17)11月1日,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依据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正式加强对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等核心技术行业的外资投资审查,同时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以及“国企对美交通行业投资”的报告,明显针对中国。

(18)11月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自今年5月以来首次通话,就中美经贸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方面问题展开谈话,并确定于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G20峰会时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随后商务部表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应该得到有效维护。但11月27日,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唯一可以接受的协议是中国开放其经济以让美国公司公平竞争,并提出几乎不太可能延迟或者取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上调至25%的决定。

(19)11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公布拟制定的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并对公众征询意见,拟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等14类核心前沿技术进行出口管制,直指中国制造2025。

(20)12月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会后,消息传出:美国明年1月1日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多关税,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产品,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标志着此轮贸易战暂缓。

以上就是此轮美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及各国博弈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均集中在关税领域,但美国与各国之间的博弈基本上是通过双边博弈来进行的,而不是各国就关税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统一的协商和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体现了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无序性、解决办法的非一致性。

2 美国发起此次贸易保护的原因分析

此次美国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主要是经济问题,但背后也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和社会根源。

首先,贸易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给

各国国内民众带来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讲,根据要素禀赋等国际贸易理论,贸易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自不待言,经济发展加快、生产率提高、各国民众享受到更丰富更便宜的产品等等。但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由于各国政策的不统一、不协调,各国生产者所得到的好处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生产者得到工作,甚至随着工作熟练程度的加深获得了更高水平的技能,但也有些国家的生产者失去了工作,生活水平下降。在美国就出现了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两极分化,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者和西海岸等地区的高科技工作者获得了收入和财富上的大幅增长,而中部老工业区的生产者由于面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低工资水平劳动者的竞争而失去了工作,很多原来在这些老工业区生产的企业和产品转移到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因此,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失去工作的美国民众用选票把特朗普推向了总统的位置。所以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应美国广大失去工作的民众的要求,这是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其次,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QE和零利率政策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民众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民众的挫折感、被剥夺感加深,社会撕裂程度加深,这也是最近几年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众质疑“经济全球化”、出现全球性的“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因此,中国成为了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主要对象,这是其深刻的经济根源。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过去五年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从11%上升到了15%,进一步引起了美国的警觉。新的冷战思维使得在位的霸权国家极力想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儒家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的崛起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领域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中美之间的分工从互补走向了竞争,尤其是中国基于产能释放的“一带一路”战略挑战了美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尤其是今年中国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纪念,从意识形态上挑战了自由主义的西方理论,尽管完全的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占据西方国家的主流,就算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美国也时不时的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因此,美国当政的鹰派重新以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这一点从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而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即可以看出,这是此次中美贸易战的政

治根源。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既有基于贸易不平衡而引起的关税问题,更重要的是存在着美国对新兴崛起国家中国的战略警惕,存在着新老全球霸主之间的打压与反打压、超越与反超越的博弈;贸易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包含着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国家战略问题,所以此次贸易战不能仅仅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必然牵涉到全球政治、国际秩序的重构。甚至可以说,各国对此次贸易战的处理有可能导致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的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式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或会逐步崩溃。

3 各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对策措施及分析

3.1 欧盟、日本等国的对策措施及分析

美国从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7月17日,欧盟和日本在东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欧盟将取消99%从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将取消94%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包括82%的农产品和水产品;今后数年内,将逐步取消99%欧盟进口商品关税。7月25日,美欧就贸易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目标是开启美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新阶段——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以更好地为全球安全与繁荣而共同努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密切关系。7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声称:必须同日本协商贸易协定。10月1日,美加墨协定谈判成功,设置毒丸条款,规定美加墨三国都不得“擅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如某一缔约方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则必须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发出通知6个月后终止本协议,并代之以新协定。

从欧盟和日本等国的应对措施来看,他们与美国之间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贸易问题,双方矛盾的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贸易领域,没有牵涉到政治等领域。

3.2 中国的对策措施及分析

从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相机抉择的办法,双方有来有往,既有“过招”,又有“妥协”。中方一方面使用数量型和质量型策略回击美方,促使其回到谈判桌上;另一方面又大幅降低关税、实现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实行金融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

2018年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序。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讲话提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和外资股权比例限制,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等。6月26日,中国政府下调亚太进口协定税率,大豆实行零关税。6月29日,中国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基本完全放开制造业的投资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显示中国全方位推进开放(4月提出扩大开放不适用于发动贸易战的国家)。7月6日,中国在世贸组织(WTO)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正式实施的征税措施追加起诉。美国和中国6日开始对对方

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双方贸易冲突大幅升级。7月16日, 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双方致力于在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确保公平互利合作, 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7月31日, 政治局二季度形势会布置下半年工作, 强调“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10月31日, 政治局三季度形势会强调: 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 有效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 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激发资本市场活力。11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宣布五大主动新开放举措: 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中日韩自贸区, 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国的应对来看, 既有针对美国贸易战的反击, 也有扩大开放、加快内部改革的举措。

12月1日晚, 习近平主席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 这是中美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会后, 消息传出: 美国明年1月1日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多关税, 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 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产品, 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 标志着此轮贸易战暂缓。此后, 开启了中美之间多轮贸易谈判的序幕。

从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之间一系列的博弈和对策来看, 似乎美国与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 他们之间的贸易战也比较容易和解。这一方面说明了美国对四面出击、同时发动针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战的战略选择;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此次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一定完全局限于经济目标, 而是针对中国的政治目标、战略目标。既有经济上的考虑, 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更有战略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重考虑, 这似乎可以归结为一个老牌帝国针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打压”, “修昔底德陷阱”呼之欲出。

因此, 中国政府在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 不仅要考虑经济问题, 还要考虑政治问题、国家战略问题, 是一个多目标决策、多个战略目标平衡的问题。同时, 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 此次中美重回谈判桌, 不仅仅是中方的需要, 也是美方的需要, 更是全球的需要。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经济增速放缓, 但我们不能为和平而和平, 更不能为了迎合美国而退让。目前中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外部环境, 而是自身改革方向、改革思路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并不取决于国际市场, 而是取决于国内市场, “出口导向政策”并不适用于拥有庞大内需市场的中国。

首先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中国不是“四小龙”, 中国的纵深很深, 有差不多十五亿人口, 有自身很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的关键是利用好自己内部的市场。从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战略上来说, 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并不是发展经济

的最终目的,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中国老百姓有房子住、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好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有好的生活用品、有好的生产条件, 而“出口导向政策”只会把我们生产的产品输送到国外, 并不能给国内的老百姓带来实质上的好处, 美国所形容的“儒家重商主义”并不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 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自己的国内形成经济上的闭环, 而不是跟着“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西方经济学理论走; 中国的内需市场尽管是“有效需求不足”, 但显然“无效需求很多”, 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是怎样把老百姓的“无效需求”转变成“有效需求”, 而不是依靠出口。

第二, 出口商品换回来的美元并不能从美国购买到高精尖技术, 也不能从美国买到高科技产品, 如果不是美元暂时还是世界货币, 能够用美元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购买到中国需要的产品, 换回来的美元就会闲置或者只能购买美国国债。

第三, 中国出口商品换回美元只会更加强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作用, 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占了全球出口很大的比重, 中国的出口使用美元计价和交易, 只会强化美元世界货币的作用, 中国需要考虑的是用人民币计价和交易, 鼓励交易对象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 使各个交易对象自动地存储人民币以作为购买中国产品的货币, 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途径, 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立以美元为基础的贷款银行、投资基金等。

第四, 尽管目前中国和美国政府的贸易战暂缓了, 但应该看到中美之间在美国霸权主义对外关系战略下是不可能不产生摩擦的, 长期来看, 中美之间在各自指导思想下的行动会不可避免地、经常性地产生矛盾。中国政府不要受美国的干扰和一部分极端自由派美式经济学家的蛊惑, 不要基于美国提出的国企的意见、对“中国制造2025”的意见就自我否定。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 政府基于精准分析扶持某些重点产业是完全合理的, 既符合“自由”的理念, 也符合“有为政府”的理念, 完全不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完全自由经济”是不存在的, 只存在于理论上; 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指的是由于市场的复杂程度导致政府采取的政策往往无效或低效, 但显然, 市场主体总是会受到各种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的影响, 政府的政策只是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因素之一, 所以, 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否定过政府干预, 否则就不会出现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了, 欧洲和美国政府对经济扶持比较少的原因是他们的政府是弱政府, 没有力量来扶持。至于美国提出的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中国不能把国企一卖了之, 而是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划成两个活动范围, 在国有企业活动的范围内禁止民营企业 and 外企参与竞争; 而在民营企业活动范围内, 实行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 禁止国有企业参与这一领域的竞争。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国有企业, 也不能一概肯定民营企业, 否则也不会出现长期以来中国发展

的高速增长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了,当然,政府可以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由于国企和民企各自缺点产生的失衡问题。

4 基于中美贸易博弈视角的全球贸易理论的创新

美国发起的此次贸易战及各国的博弈说明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失效,不管是重商主义代表斯塔夫提出的“货币差额论”、托马斯·孟提出的“贸易差额论”,还是以亚当·斯密的以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为分析基础和大卫·李嘉图的以比较优势为分析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也不管是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林德尔等学者的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偏好的多样化”、“战略性贸易”等为分析基础的新贸易理论,还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分析基础、以库恩-塔克定理和拓扑学为分析工具的角度分析方法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都是从一个国家的整体来分析国际贸易的好处、原因对其对国家的影响;强调的是各国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和生产率,从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强调的都是国际贸易给各国带来的好处,对全球经济和福利的好处;而没有把国际贸易带给各国国内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没有把国际贸易导致的对各国国内不同个体的“分配不公”和“就业替代”、“福利损失”等问题考虑到模型中去,导致近些年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运动。也就是说,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其对生产、对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创造的影响,而没有把分配包含进国际贸易模型。因此,我们必须有新的更加精细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和分析贸易对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内部不同个体的不同影响,要更加精细化地分析、解释和处理国际贸易对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不同影响,既要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家总体的影响,又要分析其对个体层面的企业和劳动者的影响;既要分析国际贸易对生产、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影响,又要分析国际贸易对分配的影响。

5 基于中美贸易博弈视角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

根据国内外各有关专家学者的梳理,目前所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有:一是多层全球治理模式,即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面中公共权威与私人机构之间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合作体系,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的或跨国的规范、原则、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二是合作型世界秩序模式,即在欧洲国家之间形成的将平等和法治运用于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模式,各方以共同的追求和目标为基础,使各方利益和要求均得到合理的考虑。三是罗斯诺的“国内-国外”边疆上的全球治理即“无政府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国内国际事务相互渗透,在国内-国外的边疆上,传统的依靠主权权威的统治收效甚微,而以权威主体为基础的治理则大行其道,所谓权威主体实际就是在某一领域得到民众支持、代表民众利益的组织或团队,他的权

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是来自民众对他的信用、支持和服从。四是国家共同治理模式,即以民族国家为国际社会的首要政治和经济单位,既坚持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首要作用,又要求国家间的合作。五是国际机制主义模式,即以共同的国际行为模式,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解决某一特定领域的国际问题。六是世界政府模式,美国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全球化下,国家并不是在消失,而是分裂成各自独立、功能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包括法院、行政部门、管理部门甚至立法部门都在与国外对应的部门结成网络,创建密集的关系网,从而结成一个新的跨政府的秩序,网络化的机构将发挥世界政府的功能,包括立法、执法和监督。大多数世界政府模式的倡导者主张改组联合国,完善国际法,树立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权威。

从美国发起此次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各国对其的反应、磋商及对策来看,以WTO为主要治理机构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1)全球性问题更加复杂,单一议题的全球性机构和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多目标决策和平衡的需要,以WTO为代表的单一议题治理机构必然会逐步合并,并走向统一的全球治理机构,比如联合国。

(2)对于涉及多个国家的共同问题的解决仍然取决于双边博弈和协商,而不是基于统一的公理和准则,由多个相关国家共同来协商解决;全球性议题的解决仍然不能做到基于公平公正的全球共同遵守的国际性法律法规,全球性的治理机制和法律法规有待于完善。

(3)全球性问题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而是深入到一国之内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调甚至已经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要同时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一国之内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从此次美国发起贸易战及其历程来看,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模式在面临来自国内不同群体承受不同影响的全球化冲击的时候,很难采取以国家为单位的一致行动策略,或者说采用单一的对外策略解决不了复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对外(国)的诉求。自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和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难以解决全球化程度加深后的国际关系问题,必须同时兼顾“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之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多个议题和目标交织在一起以及横向的、纵向的多重关系和多层次关系的协调决定着不能再简单地以某种单一的全球治理模式来处理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不管是基于单一议题的多层全球治理模式和无政府的治理模式,还是基于国家的合作型世界秩序模式和国家共同治理模式,在面对多议题交织、多层次关系需要协调的全球化深化后的国际局势时,都存在治理难题。只有基于共同的理念,以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等

为基础,构建共同的国际规则和治理机制,不仅仅以国家而是将国家、私人部门、不同利益群体等均作为治理主体,以联合国为基础构建一个公平、公正、权威、包容的类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

6 结语

鉴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使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国际社会必须创新国际贸易理论,使国际贸易理论既分析和解释了其对国家总体的影响,又反映了其对个体层面的企业和劳动者的影响;既分析和解释了国际贸易对生产、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影响,又要反映了其对各群体在利益和福利分配上的影响。同时,必须以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等为基础,构建共同的国际规则和治理机制,不仅仅以国家而是将国家、私人部门、不同利益群体等均作为治理主体,以联合国为基础构建一个公平、公正、权威、包容的类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此次事件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到构建新型的全球贸易关系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工作中去,既解决自身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又参与甚至主导新型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1][1]保罗·R·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黄卫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6-58.

[2]任泽平,熊柴,华炎雪,等.深度解读“中美贸易战”[J].四川省情,2018(04):40-43.

[3]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01):20-32.

[4]托尼·麦克格鲁,陈家刚.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01):33-42.

[5]吴志成.西方治理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4(6):60-65.

[6]易文彬.全球治理模式述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4):118-122.

[7]Thomas G.Weiss. Global Governance:A Philadelphia Moment[J].One Earth Future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2013.

[8]Timothy J. Sinclair, Global Governance[J].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2.

[9]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J].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0]Enriqueta Aragones,Santiago Sanchez-Pages,A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ased on the real case of Porto Alegr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8.

作者简介:

王上铭(1976--),汉族,湖南娄底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十八大以来我党建设中欧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SPYBZZ057)的阶段性成果。